

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
古籍版本研究组

书目文献出版社

G256.2
4

93383

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

古籍版本研究组



200183381

0269/01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阳海清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编.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ISBN 7-5013-1215-X

I. 版… I. ①阳… ②中… III. 版本学-研究-文集 IV.
G25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2409 号

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天津街七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排版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大32开本 12.875印张 350千字

199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册

ISBN 7-5013-1215-X

G·326 定价: 15.00元

前 言

三年前，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分委员会在宁波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编辑《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藉以检示成果、推动研究、嘉惠后学，委我董其役。当时大家商议，其收罗范围，可以上溯清代中叶，下迄一九八九；其篇幅，则宜控制在三十万字左右。我与本馆特藏部诸位同仁一道，广查线索，搜得二千余条款目；继议体例，原拟分辛亥革命前、民国时期和建国以后三段，详近略远，按“一般理论”、“版本源流”、“版本鉴别”、“版本学史”、“研究综述”五个方面，依时序列。后在审视材料时发现：民国以前之资料较为芜杂、细碎，且大凡带关键性的文字，多在后人之研究成果中引用；民国时期，除《书林清话》一类专著外，有一批论文，但其要义和重要材料亦已溶入后人论述之中，故予割爱，仅取建国后大陆学者之撰述。在序列上，鉴于文章内容多有交叉，故不设类目，采用“暗分明不分”的方式，粗依前述五个方面编排。

从广义上讲，中国的版本学可谓源远流长。它发轫于两汉，继起于隋唐，昌盛于宋代，成熟于前清，集成于当今。显而易见，版本学是随着书籍的发展而发展的。几千年来，中国图书之载体由甲骨而金石、而简策、而缣帛、而纸张，其制作形式或书写、或雕版、或排印、或影印，在流传中有存有佚，在篇帙上或全或残，在校勘上有精有粗，在印制上或优或劣，在装帧上代有变化，在风格上几番变更……凡此变迁，必然导致同一种书的各个本子之间产生这样那样的差异。差异就是矛盾。研究书籍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矛盾运动，版本学即应运而生。说到底，科学的本质在于揭示特定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让人们运用这些规律去能动地将该事物推向前进。既然版本学源自图书之变迁，既然图书的这种变迁又包含

着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那么版本学的内涵就必然是:从一书版本之源流出发,序其先后,审其异同,辨其全残,判其真伪,定其优劣,并从群体上寻求其变迁规律,探求其鉴别方法。这里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规定是相一致的。倘若不对各种图书的版本变迁(同一种书的各个本子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积累丰富的感性认识,版本学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倘若不将这种感性认识,放到审视和研究众多图书版本变迁中去检验、归纳和升华,版本学就难能形成一门学科;倘若不将这种认识过程循环往复地进行,版本学就无法得到发展和提高。我们所搜集到的这两千余篇文章,以及有关的专著,是历代和当代学者在版本学这个领域里所已经获得的认识的结晶,本集所收录的论文则应是当代版本学研究成果的代表。我们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来确定论文之取舍的。

凡事必须知其源方可理其流。版本学源于图书之变迁。从事过版本学研究和版本鉴定的人都知道,如果对于中国书籍制度和版刻发展过程缺乏明晰的了解,如果对于中国古籍百花园没有轮廓性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研究和鉴定中产生盲目性,甚而导致鉴定失误。这是不难理解的。进行版本研究、版本鉴别虽然总是从某一种书(扩而广之,是从某一时代某一地区的出版物或某人的著述)入手,而它在中国古籍群体中既有着自身特定的位置,且其版本变迁又必定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不弄清这种“位置”和“环境”,我们在旁稽参核时便不能左右逢源,在鉴定版本时便难以得心应手。因此,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地下文物(如甲骨、竹简)的大量出土和某些罕见书籍的发现,便有一些学者以发展的眼光、从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书籍的沿革和版本的变迁进行考察和研究,这自然是版本学的一次升华和飞跃。本集选收了有关这方面的几篇文章,庶几可据此对中国书籍制度的变革和版本发展的源流得

到较为完整、较为系统的认识。

版本学从来就不是孤单深入地向前挺进的。它与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书史学等有着相辅相成、互补互用、彼此促进的关系。可以说，它们是同源而异流。所谓同源，是指它们均以书籍作为研究对象，都产生于书籍的发展和变迁；所谓异流，则是指其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主要职能互不相同。本来，各个学科应该自有畛域，不然便难能形成独立的学科；但是，它与相关学科又并非绝若泾渭，往往有着程度不同的血缘关系或交叉关系。不唯清代和清代以前版本学的研究成果常与目录学、校雠学等相交融，就是在学科已经逐步细分的现代和当代也并未完全相分离。集中收录若干篇论述版本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的文章，或许有助于读者加深对版本学产生、发展、完善过程的认识，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与区别版本学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版本学又是一门致用科学。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前人在版本鉴定上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近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使这方面的研究陡然升温，引发了许多人去进行思考，并产生了一大批论文，其研究领域相当辽阔。它们或对前人经验进行归纳和阐发，或就鉴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出揭示和探讨；或在宏观上展开综合论述，或在微观上从事专项剖析。我认为，这是中国版本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极为难得、极有价值的大会战，不唯拓展了版本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实践中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对于这次会战的意义和影响无需等待后人去评价，在今天我们便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诚然，因为是会战，时间仓促，任务繁重，其中有些文章未免失之粗糙，有些文章停在就事论事，但毕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摆出了事实。苏东坡说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家在实战中有机会从横、侧、远、近、高、低去审视版本和版本学方面的问题，必然会有助于加深对“庐山真面目”的认识。我们在收录这方面的文章时，便

充分注意和顾及到了各个角度,以便读者能从中获得较为全面、较为实在的鉴定版本的知识与方法。

中国之版本学既源远流长,但关于版本学史的研究似尚处于拓荒阶段,有待深入耕耘和开发。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浩如烟海的版本学资料去进行挖掘和整理,编写出一部观点鲜明、脉络清晰、史料翔实的中国版本学史,是摆在版本学界的严峻课题。本集所收诸篇,或从通代、或从断代给我们大致上划出了一条史的发展线索,对我们了解版本学的发展进程有所帮助。

继晦庵《书话》之后,近年人们已注意对新书版本进行观察和探讨,这无疑是对版本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若从辛亥革命算起(事实上还可往前推若干年),新书的发展已走过了八十多年历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材料,给新书版本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学术总是在争鸣中得到繁荣和发展。一部中国学术史,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无一不以生动事例证明了这一点。版本学也不例外,时至今日,依然有些问题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有些领域则还有待去认识和开发。比如,关于版本学的源流、界说、定义、对象、任务,关于版本鉴定的原则、依据、功能、方法、技巧,以及与之相关的某些问题,即令集中所选文章也程度不同地在理解上存在着歧异,有的甚至意见完全相左。我们认为,这是好事,因为争辩将使学术得到进步。

去年年底,古籍版本研究分委员会在武昌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审阅并基本通过了本书初稿。同时确定同一作者限收一篇文章,重申凡论述一书、一人、一地版刻的文字原则上不收。据此,我们作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和补充。

入集的文章,凡能访知作者现今通讯地址的,均曾函询本人意见,有的还寄来了增、删和订正材料。文章绝大多数曾发表于各种报刊,我们仅改正了原排版时产生的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余皆一仍其旧。

在编辑过程中,不少同仁来信荐稿,限于篇幅和体例,有的文章未能采用,感激之余,并致歉意。

这是建国以来编成的第一本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限于水平和闻见,编辑中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诸君教正。

四十年来的版本学研究是有成绩的。我们衷心企盼,这块园地里将会有更多的人来耕耘,将会有更好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阳海清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

于湖北省图书馆

目 次

前言	阳海清 (1)
中国版刻发展过程	赵万里 (1)
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史话	刘国钧 (9)
中国古代书籍的发展	冀淑英 (17)
我国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比较研究	丁 瑜 (29)
我国最早的金属活字	张秀民 (37)
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	王重民 (40)
中国古代的民间刻书业	肖东发 (58)
浅谈坊刻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茆意宏 (65)
书院刻书漫话	曹 之 (74)
中国对日本雕版印刷的影响	梁静波 (82)
略论我国古代书册的形式美	何禹光 (93)
版本学与图书馆	顾廷龙 (103)
论版本	张舜徽 (111)
《版本通论》选录	吴则虞 (132)
古书版本学的起源与演变	李致忠 (139)
古籍版本与版本学	郭松年 (146)
版本学有广狭二义论——从版本学的对象说起	邵胜定 (152)
古籍版本学的功用	刘尚恒 (156)
古籍版本浅说	宋效先 (161)
论版本和善本	崔富章 (171)
论清刻古籍善本	朱泽吉 (186)
新书版本研究浅见	徐孝宓 卫扬春 (198)

古籍版本及其鉴别·····	韩锡铎	(209)
古籍版本谈·····	方原	(217)
古籍版本鉴定我见·····	叶桔	(222)
抄本及其价值与鉴定·····	沈津	(232)
谈古籍翻刻本的鉴别·····	宋平生	(251)
古籍避讳与版本鉴定·····	陈培荣	(253)
刻工与版本初探·····	何槐昌	(262)
宋代刻工说略·····	李国庆	(270)
藏书印与版本鉴定概说·····	王竞	(284)
古书牌记·····	廖延唐	(303)
古籍中伪书的辨识·····	杜凯 佟镇铠	(306)
书估作伪例析·····	王元才	(318)
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	谢国祯	(327)
版本与目录之关系浅释——中西目录学		
分类比较观·····	师道刚	(352)
论版本著录之始·····	谢德雄	(360)
宋代版本学成就管窥·····	王皓	(364)
从黄蕙翁到张菊老——150年来版本学		
的纵深进程·····	胡道静	(373)
谈叶德辉的版本学·····	刘国珺	(379)
建国以来版本学研究综述·····	石洪运 桂胜	(389)

中国版刻发展过程

赵万里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但是，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所以生产量仍是很有限制的。我们祖先经过长时期的钻研，到了八世纪前后，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的书一次印成，书籍的生产量，比过去手写本时代，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早期的刻版印刷术，是广大市民阶层传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民间需要的歌曲、日历、韵书，就首先出版流通。唐时白居易的诗，人民大众都欢喜歌唱它，元微之为白诗作序，曾说有人拿白诗印本来换取茗酒。九世纪初，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和四川民间都刻印日历，政府曾下令地方政府不得私置日历版片，可见在那时以前民间已有印本日历了。公元865年即唐咸通六年，日本入唐僧宗叡，携回日本杂书中有西川印本《唐韵》、《玉篇》各一部。近年敦煌发现的印本韵书和乾符四年、中和二年两种唐历，就是这些刊物的现存最早刻本。

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早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已有寺院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公元868年及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成熟期的作品。这卷举

世闻名的唐刻本，已于五十多年前为英人斯坦因盗去，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

九世纪末，黄巢起义后，成都顿时成为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其地盛产麻纸，这就构成了刻印书籍的有利条件。柳玘随着唐僖宗逃到成都，在书店里看到许多字书和迷信用书，都是刻版印本。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像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到了五代，蜀中统治阶级和佛教徒们都提倡刻书。公元923年昙域和尚出版了贯休的《禅月集》。公元935年蜀相毋昭裔叫人写了《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世。那时成都已一跃而为西南文化出版中心。所以宋初中央政府倡刻《大藏》时，成都工人担任着全部刻版工作，这就给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唐时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五代时冯道看到吴蜀之人鬻卖印版文字，种类不少，但没有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需要的书籍；因和李愚等建议政府国子监校刻经典。公元932年即后唐长兴三年开始工作，先刻《九经》，后及他经和《经典释文》等书，到公元953年即后周广顺三年校刻完毕。这就是宋人所称的旧监本，可惜后来都亡失了。

北宋国子监除了翻刻五代监本十二经外，又遍刻九经唐人旧疏和他经宋人新疏。以及大规模地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文选》、《文苑英华》等诗文总集。这些书籍，多数均送杭州刻版。杭州在唐五代时，经济繁荣，生产发达，浙东西盛产纸张，就更刺激了出版工作的加速向前发展。公元975年即北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是现存最古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本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书也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在工作着，这

就无怪乎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北宋时运往汴京的监本书版，靖康之变，全为金人掠去。南宋初年重建国子监于杭州，除了向附近地方政府索取史书、子书版片入监外，远在四川眉山井宪孟倡刻的南北朝七史版片也移送到监。同时，又由杭州工人翻刻了许多重要书版。宋亡后，这些版片，转送西湖书院存储。元时，余谦、叶森等曾督工整修印行。公元1375年即明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又把版片转存南京国子监。这些残缺断烂的三朝版，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因为遭受火灾，才荡然无存。

从十二世纪中叶起，杭州中瓦子街和众安桥一带书坊林立。从汴京搬到杭州的荣六郎书籍铺，公元1152年即宋绍兴二十二年翻刻了葛洪《抱朴子》。象荣六郎那样的旧店新张的书铺，在当时杭州决不止一家。十三世纪中叶，住在棚北大街睦亲坊的诗人陈起父子把篇幅比较精短的唐人诗歌和南宋江湖诗人的作品大量出版，对繁荣当时诗歌创作，是有帮助的。杭州书坊又刻印了许多民间流行的话本小说和杂剧南戏。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唯一的旧刻本。元时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尚仲贤、王伯成、石君宝的作品和杭州书会中人编写的南戏，杭州书铺也出版了不少。这些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的大量流通，对当时和后代民间文学的改进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和蜀本也颇有名，而且影响深远。现在先说建本。福建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盛产竹木，造纸工业非常发达。十二世纪初，建阳麻沙崇化两坊书肆除了出版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外，书肆主人和当地文人合作，还编印了许多适应科场需要的大型类书和市民阶层日常参考的医书、百科全书。宋末平话小说盛行，建阳书肆出版《武王伐纣》、《乐毅伐齐》、《前后汉》、《五代史》、《宣和遗事》等书，对后来历史小说的加工和再创造起了促进作用。入明，建阳书肆刻印的戏曲、小说和其他通俗书

籍，风行四方，有增无减。十六世纪中叶，刘龙田、熊冲宇、余象斗等书肆出版的书籍，门类更多，销路更广。这一出版中心，直到清初，才逐渐衰落下去。

公元971年即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五千余卷，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得名。到了十二世纪左右，这一出版中心，逐步向眉山发展。成都眉山地区刻印的书籍，一面把中央政府颁行的标准本很快翻印出来，如现有传本的蜀刻《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和《史记》、《三国志》南北朝七史，都是根据监本为底本。此外李太白、李长吉、孟东野、刘梦得的诗歌，苏老泉苏东坡父子、秦淮海散文以及许多地志、医书、类书都有蜀刻本。这些书籍，开版弘朗，字体遒劲，纸张洁白，校勘精审，可和浙本媲美。到了十三世纪中叶，成都眉山和四川其他地区，遭受元兵大肆焚掠，因此，流传到现在的蜀本，比浙本和建本都少得多。

北宋亡后，平阳代替了汴京成了黄河以北地区的出版中心。平阳又称平水，即今山西临汾，其地盛产纸张，质地坚韧，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金元两朝政府设有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从十二世纪起，开始出版古医书、类书和其他各类书籍。当时民间盛行诸宫调说唱，平水书肆适应大众需要也刻版流通，前年苏联政府赠还我国的《刘知远诸宫调》，就是平水坊本。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提到的《崔韬逢雌虎》、《离魂倩女》、《双渐赶苏卿》等著名的诸宫调，我们推测，当时平水书肆一定也有刻本。这些民间文艺创作的及时传播，对后代说唱文学和戏剧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平水书肆又曾刻印民间招贴画。帝俄时代考古家在甘肃张掖古塔内发现的平阳徐氏刻印的关羽像，和平阳姬氏刻印的王昭君等四美人像，画面生动美丽，是两幅巨大的富有艺术价值的版画杰作。元初，宋德方倡刻道藏，费了七年多的时间在平阳刻成。这部七千多卷的经版，后为元朝政府下令销毁，现今除《太清风露经》和《云笈

七签》零叶外，其余都失传了。这是一次非常巨大的出版工作，平水刻工的雕版技术却因此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稍后平水书肆晦明轩主人张存惠刻印的《证类本草》和《通鉴详节》，纸墨刻工，比过去平水本精美得多，达到当时雕版艺术的最高峰。十三世纪中叶后，平水书肆还继续刻印医书和《中州集》等书。此外，山西运城刻印的《金藏》，河北宁晋刻印的经书和音韵学书，也颇有名。这两个地区和元时大都即今之北京，也是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仅次于平水的北方刻书中心。

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包括宋、金、元三朝，除了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并互为影响外，其他地方政府、私人和书坊也都从事刻书工作。王象之《舆地纪胜》著录的方志遍及四川、广西、海南岛等边远地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们试把宋人《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明初《文渊阁书目》和其他文献资料来统计一下，见于著录的绝大部分都是刻版印本，就可知道宋元两朝书籍的出版量是如何的庞大了。

明清两朝各地刻印的书籍，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比之前代，不知超越了多少倍。明初，南京国子监集中了杭州和江南其他地区的宋元版片，连宋时广西桂林刻印的《桂林志》版片，也运到了南京，南京立刻代替了杭州成为全国出版中心。南藏和明初的官刻书，都在南京出版。南监本史书和其他书籍的补版翻版工作，也由南京刻印工人担任。十六世纪前后，南京、苏州、徽州、杭州、吴兴等地私人和书坊刻印了大量医书、戏曲、小说和其他各类书籍，出版量激增，销路远及国外，对当时和后代应用科学和文艺创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一部分徽州刻工搬到了南京，南京又成了彩色套印木刻画和技术革新的中心。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性的刻版中心。北藏、道藏、龙藏和明代经厂本、清代武英殿本，以及私人和书坊刻印的书

籍，纸墨之精、雕印之工、装潢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由于书籍大量出版，需用纸墨越来越多。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发达，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不断增加，就更为大量刻印书籍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以江浙等省的藏书家如袁褰、胡震亨、毛晋、黄丕烈、鲍廷博等同时又是刻书家，他们翻刻了许多对学术研究有益的参考用书，行销全国。各地书坊还刻印了大批通俗书刊如驻云飞、挂枝儿、山歌、弹词、鼓词等唱本，为广大市民阶层所喜爱。大中小城市都有刻字铺。明清方志的木刻本遍及各边远地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各地刻版印刷工作的蒸蒸日上和空前发达。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近代印刷术输入中国，上海、广州、汉口等地陆续铸造铅字，出版书报。古老的刻版印刷术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才逐步走向衰落。

活字版印刷术是公元1045年前后即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的。它比德国的谷腾堡早了四百年。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又一伟大贡献。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版，先用黏土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排列在铁制的框子里，印书前，把铁制框子放在敷有药品的铁板上，加热，等药品凝固后，便可以印书了。十三世纪末即元大德初年东平人王桢发明了转轮排字架，用特制的木活字，安放在转轮上，试印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月就印成一部。毕升和王桢发明的快速印书法，和刻版印刷的工作进度简直无法相比。

宋元入活字版印书，很早就失传了。现在流传的最古的活字版，要算十五世纪末苏州、无锡、南京一带盛行的铜活字印本，出版量最大的有无锡安家和华家。这两家印的古类书、唐宋人诗文集和水利专业用书，行销各地，为后来藏书家所重视。此外徐某印的《曹子建集》，杨仪印的《五岐公宫词》，张习印的《范石湖集》、《孙贲西庵集》，都是苏州出品。张某印的《开元天宝遗事》，贾咏印的《庄子口义》，都是南京出品。又有人用铜活字印了大批唐人诗集，分

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也是这一时期苏州一带出品。同时，常州人还用铅、锡活字版印书，可惜现在都早已亡失了。

公元 1726 年即清雍正四年，陈梦雷用新造的铜活字排印了六十四部《古今图书集成》，每部五千二十册。公元 1773 年即清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的排字工人又用木活字出版了新从《永乐大典》发掘出来的宋元佚书和《畿辅安澜志》、《琉球国志》等书一百三十三种。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活字版印刷工作，都是史无前例的。但运用前人遗法加以大胆革新的，要数泰山徐家的磁版和泾县翟家的泥版。住在山东泰山一带的徐志定，公元 1719 年即康熙五十八年创制了磁版，出版了张尔岐《周易说略》。公元 1844 年即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费了三十年心力，创制了泥活字十万多个，印了黄爵滋的文集《仙屏书屋初集》、自己的诗集《泥版试印初编》和《翟氏宗谱》三书。此外明末和清代的京报，各地家谱和民间小唱本，用活字版排印的也不少。

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中国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七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和敦煌发现的许多宗教画，艺术已渐趋成熟。宋元木刻画从宗教画发展到百科全书、文学、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书籍，《证类本草》、《三礼图》、《宣和博古图》、《事林广记》、平话小说的插图，出现了不少艺术质量很高的作品。明代各地书肆刻印了大量佛经、戏曲、小说和其他通俗书籍，几乎没有不附插图的。十五世纪初叶，徽州派版画兴起，直到十七世纪末，徽派版画独步一时。徽派刻工在徽州、杭州、吴兴、苏州、南京等地镌刻的木刻画，特别是戏曲、小说的插图，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那时著名的画家，曾为木刻家创作画稿，如丁云鹏为木刻家黄麟、黄应泰等画的程氏墨苑，陈老莲为木刻家黄子中画的博古叶子，清初萧尺木为木刻家汤尚、汤义、汤复画的太平山水图画和离骚图。许多木刻家的创作能力，通过艺术